

主编 陈大政

曾国藩全書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

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身逢衰颓之世 心仪兴盛之国	1
扶危救弱	22
除旧布新的改革者	26
功败垂成的改革	30
庆历改革	34
起衰振隳	37
激浊扬清	46
天国新政	50
维新变法	53
改良图强	55
改革的先行者	57
礼法并用 软硬兼施	61
何以长治久安	65
通达民意	66
治民如用兵	67

先礼后刑	67
鼓励批评	68
以德服人	68
以礼治国	69
痛陈时弊	69
重本轻末	71
崇尚德治	72
从大处着手	73
赏罚分明	74
见仁见智	74
宽民惠民	76
纲举目张	77
民为邦本	78
教民化民	79
审时度势以利导 顺天应地得人和	81
以德报怨	90
将计就计	91
老马识途	92
急中生智	93
巧施苦肉计	93
勇者无惧	93
装疯免祸	94
息怒有术	95
鸡鸣狗盗	95
妙言救国	96

死人报仇	96
智脱险境	97
大智若愚	98
假假真真	98
因势利导	99
逼人就范	99
因时制宜	100
头盔的妙用	101
智取援助	102
假天救己	102
顺水推舟	103
政有轻重缓急 事分大小巨细	106
贪小失大	106
争功落败	107
擅权生弊	109
纲举目张	111
避重就轻	112
讳弊杀谏	114
只图眼前	116
直谏见信	118
急功近利	119
统一是根本	126
当非常之时 用非常之法	129
周公制礼作乐创一统基业	139

周宣王革新中兴周室·····	140
齐相管仲治齐方略·····	141
子产相郑改革图强·····	142
吴起奖耕战兴楚策·····	143
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144
李悝变法强魏策·····	145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46
公孙鞅变法强秦术·····	147
光武革除王莽弊政中兴汉室·····	148
孝文帝移俗行汉化·····	149
孝文改制图国强·····	150
柴荣力改五代之弊·····	151
杨坚称帝改官制·····	153
唐太宗破门第观念·····	154
武则天“开汲引之门”·····	155
宋太祖黄袍加身集权策·····	156
陈平巧设反间计·····	158
张良设计安嗣·····	159
左宗棠巧借俄粮复新疆·····	161
刘铭传筹防十策·····	162
严以惩官场之贪 宽以养士林之廉·····	163
孝文帝惩贪图治·····	165
李世民劝臣莫贪·····	165
唐德宗惩贪绝贿·····	166
朱元璋严惩贪官·····	166

陈星卿扶弱抑强·····	167
况钟严惩贪官·····	168
段广清巧惩贪狡·····	168
赵大鲸示门人以惩贪之法·····	170
裴佗秉性刚直·····	170
修枝固根防大乱 革故鼎新取中庸·····	172
夏启创行世袭制·····	175
盘庚迁殷固商祚·····	178
商鞅立信变法·····	180
秦朝废分封行郡县·····	183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187
刘邦力行革新·····	190
汉初“承敝易变”成大治·····	191
晁错痛厘祖制·····	195
严禁外戚干政·····	196
整肃浇薄世风 培育醇厚民德·····	199
古公亶父革除戎狄之风·····	201
周公旦一改商风·····	202
楚昭王不祭云河·····	204
孔子创私学·····	205
西门豹巧破陋俗·····	207
汉文帝倡改厚葬之风·····	209
匡衡纵谈改世俗之道·····	212
桓谭斥谶纬邪说·····	213
汉明帝禁民间厚葬·····	215

皇甫隆改革民俗·····	216
曹操禁绝“寒食节”·····	217
魏孝文帝改革婚俗·····	220
魏孝文帝文化改革·····	222
武则天反对男尊女卑·····	227
姚崇灭蝗救灾·····	229
平息民怒 剿抚并用·····	232
先安内 后攘外·····	246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	251
对“闽变”的镇压·····	260
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265
师夷之长技 固我之根本·····	281
李鸿章办洋务·····	294
洋务明星盛宣怀·····	323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西洋之助，焉能有利无弊！·····	358
诚者有信礼强敌 愚也无用招轻慢·····	376

身逢衰颓之世 心仪兴盛之国

曾国藩 1811 年 11 月 26 日（清嘉庆 16 年 10 月 11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他家世代务农，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传说曾国藩出世那天，他的曾祖父竟希公当晚梦见一条巨蟒，鳞甲灿烂，自空中盘旋而下，直入曾宅，旋即闻报曾孙出世。曾竟希大喜，自云，“是家之祥，曾氏门间，行将大矣。”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梦境喻示了曾国藩不同寻常的一生。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愤自强的理念与信念。待到他科名顺遂，入点翰林，便立定了澄清天下，藩卫国家的志向，于是又更名为“国藩”。可见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志向既远且大的人。

在曾国藩的家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祖父曾玉屏（星冈公），曾玉屏威毅、勤谨，眼界不俗，富有见地。他教导曾国藩说，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的八字诀（早、考、扫、宝、书、蔬、鱼、猪）和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被曾国藩反复品味，作为曾氏家族的家训主要内容。曾国藩从他敬爱的祖父那里至少学到了四种品格：自强、勤勉和谨慎，还有威仪。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竹亭公），备尝科场艰辛，他应试 17 次，直到 43 岁才中了个秀才，曾国藩很少像谈祖父那样谈到父

亲；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比如他父亲的积苦力学，侍亲至孝，柔而能忍，都能在曾国藩的身上找到巨大的回响。曾国藩参加童子试，也先后考了七次，参加会试，也考了三次，只不过他比父亲幸运一些罢了。他被称为“第一世忠臣孝子”，每年寄钱养亲，替父母教育兄弟，“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这都是从他父亲那里承继来的。他一生都处于拂逆之中，也遭受过奇耻大辱，但他能挫而愈奋，屡挫屡振，不正是他父亲的“柔而能忍”的真实写照吗？此外，曾国藩的母亲对他影响也很大，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曾国藩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为他设了一所家塾，聘陈雁门先生教他读书识字。父亲曾麟书在屡考秀才也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也在自己家里设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见斋”，教授十几个学生。曾国藩便转从父亲念书，这对于曾国藩的教育，无疑是有益的。在父亲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拿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14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大加夸奖。欧阳凝祉是衡州府八股文的能手。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以“共登青云梯”为命题，教曾国藩作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为他前程无量，当下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此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去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

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惟恐贻误孩子的前程，便将曾国藩送往衡阳，从师于汪觉庵先生，接着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经名师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年前，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然是欢欣鼓舞。该年十二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极不便利，来回的路费甚多。曾国藩征得祖父和父亲的同意，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下一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十分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曾国藩这位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北，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此时，身边所剩下的路费已经没有什么了。途经睢宁，便向在此任知县的湘乡人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以充作路费。途经金陵（今南京）时，在书摊上看见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曾国藩爱不释手。恰好从金陵到

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买好，曾国藩使用借来的钱和典当随身携带的皮袍冬衣，买下那部《二十三史》。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惜为你还债，但望必须勤奋攻读，不负我的一片苦心。”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奋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这样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再次入都会试，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照一般情形来说，读书人能够在一连串的科举考试中先后得捷，已经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应该是踌躇满志了。但就事实而言，则又不尽然。因为在进士之上，还有更高的一层，即“点翰林”。中了进士，不一定能做高官；被点了翰林，才具备了做高官的条件，并且升迁很快。但点翰林必须进士的名次考得好。一甲进士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榜发之后，即可被授职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立刻成为名实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进士要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教习三年，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正式成为翰林院中的一分子。否则，或改官部属，或授职知县，从此与翰林绝缘。而进士参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为多，三甲者寥寥无几。如果曾国藩考不好，他在中了三甲进士之后就很难成为庶吉士，更不能成为“翰林”。这一次朝考对于他一生的官职升迁，都有巨大的影响。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

二名。就这样，他便被选入翰林院的庶常馆深造，当了庶吉士。

这一年的秋天，曾国藩踌躇满志地启程回家。曾家世代代，只有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可谓衣锦还乡。他的祖父因此大宴宾客，十分热闹。但祖父却没有任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想法；酒席散罢，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家以农为业，虽然富贵，但仍不要失去旧业，国藩他身为翰林，但事业方长，家中食用不要依赖于他。”因此，曾国藩在京十余年，没有被家事所累。又很早摆脱八股的束缚，放手追求真正的学问，打下事业的基础。

曾国藩能进翰林院，是他人生的一大机遇。从此如鱼得水，充分发挥苦啃书本的特长，通过二、三年一次的大考，十年间竟一路攀升到礼部侍郎。这样的官运，是极为罕见的。如此宦途得意，对他今后的成功影响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湘，哪里会有一呼万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南士人的领袖呢？机缘巧合的作用在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另一大收获，是造就了理学功夫。他的成功，是有学术背景的。在进京之前，他做的是试贴功夫，为科名而读书，对人生大学问还没有沾边。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理学大师唐鉴，再就是用功最为诚笃的倭仁。从此，他以《朱子全书》为课程，以礼学为皈依。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老大学问，他探知了底蕴，掌握了精髓，这是他赖以建功立业的大本源。他在同辈官僚士大夫中，天分不算太高，却能成为事实上和精神上的领袖，其原因就在这里。他在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屡蹶屡振，死战不退，其精神上的靠山，也就在这里。

清朝自乾隆以后，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到道光年间，更成

腐朽崩贵之势。这时，民生凋敝，灾变相乘，国事不堪闻问；而官僚机器几近于瘫痪。大官“优容养望”，小官“软熟和同”，这对于农村出身，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待卖过菜篮子的曾国藩来说，如何看得惯？虽然个人官运亨通，但官场习气太坏，国将不国，对血性过人的青年曾国藩来说，也只有求退归乡一条路。

咸丰元年，官逼民反，太平天国革命像澎湃已久的火山熔岩一样，终于爆发了，身为礼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乘皇帝下诏求言的机会，愤然而出，连连上疏条陈时弊，激切伉直、毫不避讳。如说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好用“谐媚软熟之人”，以至满朝文武“疲恭沓地，相与袖手”。还批评皇帝“黔陟大权，联自持之”，颇有孟夫子的民本意味。当时咸丰帝见了这篇奏疏，气得一掷于地，喝令军机处重加惩治。后军机大臣祁隽藻频频叩头，才使事态平息。曾国藩在京期间的政治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有抱负，有血性，可以担负重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锋芒毕露，不顾一切的个性，致使朝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他始终怀有戒心。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八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十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十一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十二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

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十二月起，至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士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苦

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作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在，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泸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二万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师主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把濒临绝境的战局挽回了。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七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北，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四千号，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了三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郝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一年零四个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

曾国藩再度出山。十年（公元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推垮，清廷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三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五十四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令人沉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授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六十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五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至曾国藩在胜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之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宗教热情顿时冷淡下去，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打仗，王闿运的《湘军志》也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的几次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